

# 中国经济转型的低成本 路径: 和谐与合作

刘根荣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降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有效路径。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富裕人民, 和谐转型要注意克服贫富两极分化问题, 而和谐中转型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各种经济成分和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和谐; 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2X(2007)03-0027-03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已进行了 20 多年。中国已经和正在经历“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为内容的经济转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转型,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经济转型是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转型本身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部分群体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 因此, 会产生社会矛盾和摩擦。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 由于采取了所谓打破“铁饭碗”、下岗之类的简单方式来推进改革, 追求效率, 因而使社会矛盾积累日益严重。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卫生体制、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深入, 形成了所谓“新三座大山”之说, 老百姓普遍反映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出现了不利于深化改革的某种社会情绪。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矛盾需要及时化解, 转型过程中的成本需要有效降低。否则, 由此产生的社会摩擦和冲突可能降低转型效果, 阻碍转型进程。如何寻求一条低成本路径推进中国的经济转型? 这就提出了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 一、和谐是降低转型成本的有效路径

我们要正确认识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转型、经济发展的关系, 概括起来就是和谐中转型与发展中和谐。和谐与市场化、经济发展具有同一性。一方

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 建立在富裕的基础上, 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 这是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有些人把现在的不和谐问题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认为不和谐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这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市场经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 市场化就是要解决发展问题, 并在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不要转型, 而是要降低转型成本, 减轻转型的摩擦。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转型成本。经济转型的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化成本。市场化会伴随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转型阶段, 两种体制并存, 市场机制不完善, 法制不健全, 因此会导致比其他阶段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市场秩序问题。二是现代化成本。最为突出的是结构调整, 使传统部门衰落和使新兴部门兴盛, 从而在一段时间内拉大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一部分劳动力下岗, 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 加上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三是全球化成本。国内市场国际化导致激励竞争及相应的成本加大, 使竞争力弱的民族产业受到巨大冲击。所有这些成本都可能成为转型阶段社会不和谐的原因。经济转型需要在和谐中实现, 这就需要降低转型成本, 通过构建和谐社会降低改

收稿日期: 2006-11-29

作者简介: 刘根荣(1970—), 男, 福建宁化人,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

革成本。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是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的目标,也是转型阶段所要解决的课题。我国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公平,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应该说,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是对的,否则就没有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单纯以效率为目标的转型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公平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应该说,现在人们对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已经逐渐适应,但对分配权力的不公平则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财产分配关系的不公平反映这种权力的不公平。二是市场交易的不公平。既包括交易不公平,也包括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行为坑害消费者的不公平。三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政府行为,更应该讲公平,但现实存在的寻租现象导致了不公平。特别是在许多场合,在公共产品供给也要讲效率的幌子下,市场化渗透到公共产品领域中,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平。所有这些不公平因素累积下来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的不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实际上正在影响效率,并且正在侵吞市场化的成果。当然,不公平及不和谐并不是市场化的过错,不能说 unfair 现象是市场化带来的,也不能说解决公平问题就要放慢市场化的步伐。问题是市场化本身不具备解决不公平问题的能力,需要寻求在市场化进程中解决公平的机制。

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富裕人民。这也是经济转型能够博得人民广泛支持的坚实基础。富裕人民,提高收入不仅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富裕人民的主要标志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减少低收入人群。这是和谐与转型同一性的基础。在现阶段无论是转型还是发展,都需要有建立在一定利益格局中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是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这就是所谓的“富而思进”。富裕人民,就需要调整人民的收入结构。收入结构主要由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三部分组成。后两种属于非劳动收入,它们是中等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富民就要特别重视后两种收入的比重,就是说,富民不仅要增加人民的个人劳动收入,更要增加人民的财产及相应的财产收入,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持有股份、知识产权的增加。与此相适应出台各种富民政策,鼓励创业,鼓励

投资,鼓励科技入股等政策就应该成为富裕人民的主要途径。

在和谐中转型要注意克服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明显反映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由此导致社会的紧张和社会治安的混乱,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如果我们的改革最终目标只是追求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而忽视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有可能滑向失败的深渊。当沿海地区达到小康水平,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就要提出先富帮后富的问题。既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行业 and 一部分先富起来人的发展活力;更要关心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众的生活,使他们感觉到社会主义的温暖。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使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过去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这就涉及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富裕程度的判断问题。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富民不仅要看平均收入,更要看达到平均收入的人数,就是不仅要看平均数,更要看大多数。例如在我国一些地区,确定的农民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的指标是农民人均年收入 8000 元,需要关注的是达到这一标准的农民人口有多少,如果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此水平以下,全面小康就得不到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最低限度需要 60% 以上的人口达到这一水准以上,才是达到全面小康水平。“拉美现象”值得注意,以巴西为例,2002 年人均 GDP 突破了 3000 美元,城市人口比例达到 82%,应该说达到了我们所说的全面小康的标准,但在其 1.7 亿人口中,约 33%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者主要是农民。贫困人口的存在使得巴西政府不得不回过头来解决农民问题。

## 二、合作是和谐转型的前提条件

在和谐中转型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形成各种经济成分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合作,这里涉及到发展理念的更新。过去的理念认为矛盾、斗争、竞争是发展的动力,而在现代经济中,和谐、合作是发展的动力,而且和谐、合作推动发展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讲到:“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

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就是和谐社会。经济转型就是要把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各种积极性充分迸发出来。

要实现在合作中和谐转型,必须确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党的十六大所明确的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要调动和凝聚一切积极的因素和积极的力量,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需要突出解决以下问题:首先,现代经济重视竞争,但更重视合作。市场经济是竞争与合作相兼容的经济。竞争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本身也有成本。如果竞争成本过高,高于竞争效率所产生的收益,这种竞争就是不经济的。特别是在市场秩序混乱条件下的恶性竞争,造成过高的竞争成本,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降低竞争成本的机制,这就是合作。竞争与合作相结合就可以降低竞争成本,从而放大竞争的效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经济中,由于信息与网络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广泛运用,市场经济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信息技术对系统有很强的依赖性:兼容和资源共享。如果出售的组件与系统不能兼容就无法进入市场,而得不到共享资源就不能得到规模效益。这样,市场参与者与其说关心竞争对手,不如说更关注合作伙伴。为了进入市场,就要重视其产品在技术标准方面与其他合作者的兼容性,为了得到规模收益,就要重视资源共享,既要共享别人的资源,又要使自己的资源让别人共享。

其次,建立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等非劳动收入都是要素收入。资本收入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剩余价值,是剥削收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都是共同地增加社会的财富。因此,明确资本收入、劳动收入、技术收入、土地收入都是要素收入,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更加有利。针对要素属于私人所有的现实,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可能实现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只有在分配体制上解决好“各得其所”,才能激励“各尽其能”。在包括劳动、知识、技术、企业家等要素所有权属于私人的情况下,按照各种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不仅能刺激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劳动投入,还能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投入。由于各得其所体现了平等,就能形成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和谐相处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使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

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迸发。

第三,建立劳资合作关系。《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劳资对抗关系是建立在劳动者除了双手外一无所有,而资本家则凭借资本以获取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可能有资产,也可能持有股票,持有企业股权,拥有知识产权,也可能拥有房产等。而资本所有者也可能拥有劳动,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投入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劳动、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基础。这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既然资产者有劳动,劳动者有资产,这就产生了劳资合作问题。现阶段,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在社会主义背景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增强劳资合作关系。一方面政府要善待民营企业主,员工不以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应该善待员工,保证其合法权益。

第四,企业改革应由减人增效转变为增效稳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负担较重,其中包括人员负担过重。因此,改革不可避免地提出卸包袱的要求,特别是通过下岗把职工推向社会。以减人为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将企业内部改革的成本外在化,社会不可能长期承受众多企业改革的外部化成本,社会无法安置长期存在的、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从和谐转型的角度出发,改革不能与减员增效划等号。改革就要减人,这不是以人为本。减人以后才增效,这不是真正增效。以人为本的改革认为人不是提高效率的负担和包袱,而是实现发展、提高效率的人力资源。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提出减人的合理性是当时的企业改革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既定资源条件下的改革。现在企业的改革是开放性的,企业增效可以通过获取企业外部资源取得,可以开辟新的市场,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增效的企业就要稳住就业,即增效稳人。这是企业将改革成本内部化,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刘根荣. 市场秩序理论研究: 利益博弈均衡秩序论[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孙小勇)